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社会性别分析

——以西部小额信贷组织为例

王卓 李小雨 吴迪

【摘要】 社会性别视角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独特视角，本文以对西部农村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小额信贷扶贫活动进行的社会调查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小额信贷这一农村民间金融形式中的性别差异，具体剖析了西部农村男性和女性在小额信贷贷款需求、贷款用途、贷款使用效果、组织化需求、社区团结与互助以及男女对小额信贷扶贫功能评价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及其显著性。由此可见，要切实改革传统农村金融的经营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全新的社区金融意识；同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树立金融服务的社会性别意识，使普惠金融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流。

【关键词】 小额信贷；农村女性；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2.82；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08) 02-0124-09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性别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社会性别是针对生物性别而提出的。传统的性别概念是指生物性别，即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分工、性别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等，它是在生物决定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规定，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刚强、女性柔弱，男性被型塑为“男子汉”、女性被型塑为“贤妻良母”等等，不一而足。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它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社会性别在女性主义眼里，不仅代表一种个人的性别身份，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1〕}社会性别意义上的性别分工、性别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等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应具有社会适应性，强调社会对两性需求，尤其是

女性需求进行回应时的公正与合理，社会性别承认自然状态下两性之间的差异，否认诸如男主外、女主内等分工的合理性，主张男女两性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而非主从的关系。

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很难回避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意识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淡漠，产生了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这个社会从何时开始看起来就好像没有了女性的声音，没有了女性的经验，没有了女性的知识，没有了女性的贡献，也没有了女性的权利和主张……当下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男性主流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男女合作的伙伴性社会，女性如影子一样在男性主流中生存和挣扎着，并且无条件地沉默。^{〔2〕}

性别歧视或者社会性别意识缺乏导致的这些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社会学研究”（05BSH032）

【作者简介】 王卓，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小雨，吴迪，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问题,不仅影响着妇女自身的身心健康,也影响着两性共有的文明和进步,更阻碍着家庭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这里可能有方法学上的无知,也可能有意识形态上的盲视。

著名的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诺斯教授,以其独特的女性关怀主义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简称GB式小额信贷)有一个显著特征,它重点向贫困妇女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基于一种对孟加拉国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深刻认识,尤诺斯教授认为贫困妇女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支持和帮助。孟加拉的贫困妇女在获得乡村银行小额贷款服务过程中,不仅在经济上逐步获得独立性并由此改善其在家庭中的权力分配和地位,同时乡村银行还把贫困妇女组织起来建立互助联保的小组和中心,通过长期的组织化和社会化过程使以前连面都不能外露的贫困妇女获得话语权和话语能力而建立起社会参与能力和参与途径。现在,孟加拉全国1.2亿人口中,有700多万个贫困家庭成为乡村银行的会员,其中妇女为主的家庭占96.7%^[3]。毫无疑问,孟加拉乡村银行在一个性别歧视极其严重的社会里融进了强烈的社会性别意识,并努力将这种意识化的小额信贷模式向其他国家和社会推广,其意义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报告中所称:“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会成为可能。小额信贷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贫困的妇女实际上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引入GB式小额信贷以来,实践层面和研究层面对于妇女和男人在农村金融服务上是否有不平等待遇,进而农村社会里是否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经历了从争论到回避的过程。在主流或者男流^[4]的金融体系里,几乎没有社会性别这个说法。换言之,即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女性在金融资源的获得中与男性有差异。在农村民间组织的小额信贷实践活动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额信贷设计中缺乏性别敏感性^[5],并由此对卷入其中的女性产生了若干负面的影响:(1)小额信贷仍承袭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着重经济的增长,未充分注意到妇女自身利益的需求,

妇女的劳动负担因参加小额信贷活动而增加。(2)小额信贷设计中没有考虑到改变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出现妇女出面借钱,男性经营使用,如果失败,妇女承担还贷责任,结果是妇女承受小额信贷增加的经济风险和心理负担却并未获得支配资金的权力,这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3)妇女承担经济风险的代价往往是放弃个人的其他福利,减少个人的生活需要,比如妇女靠减少吃鸡蛋的次数甚至不再吃鸡蛋而把钱节省下来还贷款。^[6]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问题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男人们认为自毛泽东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开始,中国社会就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在一些地方,比如四川,“妇女比男人还厉害”,当家的基本上都是女人。于是,一些小额信贷组织竭力主张要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要是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创新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模糊贷款对象,并业已形成共识:中国社会男女平等,在金融资源的获得性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农村社会不存在性别差异。

事实是什么呢?

二、研究方法的说明

本研究拟通过对西部包括四川、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新疆等6省(自治区)、12县的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所服务的30个乡村、约100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资料来检验上述“共识”的真伪,同时讨论农村民间金融服务中社会性别意识建立的必要性。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同时尝试以性别作为变量,以女性视角和社会性别方法开展社会学研究。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四川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组2006年对中国西部6个省所进行的农户调查,还来源于作者多年的田野调查和观察积累。

调查样本的抽取采用了多阶段抽样。第一阶段是调查省和县的选择,主要根据中国小额信贷促进网络年度数据(2006)随机抽取了6个省12个县^①。第二阶段按PPS抽样,从选中的调查县抽取2-3个乡(镇),然后从选区的乡(镇)随机抽取2-3个村。第三阶段,是从抽取的调查村

① 这12个县的小额信贷组织分别是:四川省贫困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会金堂县栖贤分会、阆中市乡村发展协会、通江县广纳分会、兴仁县乡村发展协会、紫云县乡村发展协会、都安县乡村发展协会、大化县乡村发展协会、通渭县乡村发展协会、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和田市中加项目办小额信贷中心、和田县兴村发展协会、皮山县乡村发展协会。这些组织对调查给予了支持,在此,作者致谢。

中采用偶遇调查法抽取农户。调查对象包括了获得小额信贷的农户和未获得小额信贷的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966 份, 回收率 96.6%。样本农户分布于西部 6 省中开展了农村民间小额信贷模式的 12 个县, 这 12 个县中既有以妇女为重点服务对象的小额信贷组织, 如宁夏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小额信贷服务中心等; 也有不强调性别差异的小额信贷组织, 如四川省贫困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会。实际调查过程中, 调查组织者没有事先向调查员说明社会性别的研究方法, 仍沿袭传统的研究线路, 引入性别变量进行分析是调查完成之后才有的考虑^①。

调查的样本中, 女性有 528 人, 占样本总体的 54.7%; 男性有 438 人, 占样本总体的 45.3%。主要人口学特征如表 1:

表 1 调查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 特征项 | 类别 | 总体 | | 男 | | 女 | |
|------|---------|-----|-------|-----|-------|-----|-------|
| | | 频次 | 有效百分比 | 频次 | 有效百分比 | 频次 | 有效百分比 |
| 年龄段 | 20 岁以下 | 8 | 0.8% | 3 | 0.7% | 5 | 1.0% |
| | 20—30 岁 | 150 | 15.6% | 69 | 15.8% | 81 | 15.4% |
| | 31—40 岁 | 402 | 41.8% | 171 | 39.2% | 231 | 43.9% |
| | 41—50 岁 | 266 | 27.7% | 127 | 29.1% | 139 | 26.4% |
| | 51—60 岁 | 101 | 10.5% | 48 | 11.0% | 53 | 10.1% |
| | 60 岁以上 | 35 | 3.6% | 18 | 4.1% | 17 | 3.2% |
| 职业身份 | 从事种植业为主 | 541 | 56.0% | 230 | 52.5% | 311 | 58.9% |
| | 从事养殖业为主 | 107 | 11.1% | 38 | 8.7% | 69 | 13.1% |
| | 从事加工业为主 | 52 | 5.4% | 18 | 4.1% | 34 | 6.4% |
| | 经商为主 | 148 | 15.3% | 85 | 19.4% | 63 | 11.9% |
| | 私营小企业主 | 19 | 2.0% | 16 | 3.7% | 3 | 0.6% |
| | 外出打工为主 | 40 | 4.1% | 26 | 5.9% | 14 | 2.7% |
| | 家务劳动为主 | 31 | 3.2% | 2 | 0.5% | 29 | 5.5% |
| | 无业人员 | 4 | 0.4% | 2 | 0.5% | 2 | 0.4% |
| | 其他 | 24 | 2.5% | 21 | 4.8% | 3 | 0.6% |
|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456 | 47.3% | 137 | 31.4% | 319 | 60.4% |
| | 初中 | 386 | 40.0% | 205 | 47.0% | 181 | 34.3% |
| | 高中 | 100 | 10.4% | 76 | 17.4% | 24 | 4.5% |
| | 中专 | 17 | 1.8% | 14 | 3.2% | 3 | 0.6% |

| | | | | | | | |
|------|----|------|-------|------|-------|------|-------|
| 婚姻状况 | 大专 | 5 | 0.5% | 4 | 0.9% | 1 | 0.2% |
| | 未婚 | 24 | 2.5% | 20 | 4.6% | 4 | 0.8% |
| | 已婚 | 908 | 94.0% | 402 | 91.8% | 506 | 95.8% |
| | 离婚 | 11 | 1.1% | 9 | 2.1% | 2 | 0.4% |
| 丧偶 | 23 | 2.4% | 7 | 1.6% | 16 | 3.0% | |

三、研究发现

1. 贷款需求的性别差异分析

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 男女在贷款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2 可以看到, 男性农户平均每年需 9461.9 元贷款才能满足生产或生活需要, 而女性农户只需 6025.6 元, 远远低于男性的需求。目前, 国内许多民间小额信贷组织贷款产品量的设计分为两个额度, 一是 5000 元以下, 二是 5000 元到 10000 元。在实地访问组织负责人为什么做这种量的限制时, 没有人提到是基于性别的考虑, 而是和贷款的用途有关, 即额度小的主要是农业生产性贷款, 额度大的主要是加工和商业性贷款。

在向他人, 包括各种机构和组织借钱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时, 男性和女性农户感受到的难易程度有一定差异,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借到钱, 但这种差异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的解释是农村金融环境整体不利于农户。

表 2 贷款需求的性别比较

| | 男性 | 女性 | 显著性 |
|----------------------|--------|--------|-------|
| 贷款需求均值 (元/年) | 9461.9 | 6025.6 | 0.000 |
| 借钱的难易程度 ^② | 3.02 | 2.97 | 0.432 |

注: 本研究选择的显著性水平为 $p < 0.05$, 以下各处都如此。

农户主要通过小额信贷项目、信用社和亲戚朋友获得生产生活所需贷款, 2005 年至 2006 年 7 月 (问卷调查时间) 以来, 分别有 82.91%、27.12% 和 31.57% 的被调查农户通过这三种渠道获得贷款。虽然在不同渠道的人均贷款次数上, 性别没有显著差异, 但在贷款金额上, 男性和女性明显不同 (见表 3)。在向信用社和小额信贷项目借钱时, 男性农户能获得比女性更多的贷款; 而在向亲戚朋友借钱时, 女性的人均贷款金额则远高于男性。

① 作者于 2007 年参加了中国社会学年会, 注意到社会性别研究方法可用于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研究中, 于是作此尝试。

② 难易程度设为“很容易”、“容易”、“一般”、“困难”、“很困难”五级量表, 分别赋值 1-5 分, 进而计算均值和显著性 P 值。

单就小额信贷这一渠道而言,自知道小额信贷以来,男性累计获得的这类小额贷款均值为8618.9元(标准差为7945.2),而女性为5929.2元(标准差7247.3),显著性检验 $p=0.000$,即男女性别在获得小额信贷量上的差异是显著的。但男女承担的小额信贷利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平均年利率为8.42%(标准差6.06%),女性为8.08%(标准差3.10%),显著性检验 $p=0.294$,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贷款需求及其满足上的性别差异说明,至少在贷款额度上,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农村信用社在金融服务上的重男轻女现象一直是无意识地存在。而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有社会性别意识,但由于降低直至忽略性别差异,因此也走向了“重男轻女”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表3 不同渠道的贷款次数和金额的性别比较

| | | 人均贷款次数 | 显著性 | 人均贷款金额(元) | 显著性 |
|--------|---|--------|-------|-----------|-------|
| 信用社 | 男 | 1.46 | 0.452 | 8414.42 | 0.037 |
| | 女 | 1.4 | | 5599.87 | |
| 小额信贷项目 | 男 | 2.01 | 0.138 | 4596.12 | 0.000 |
| | 女 | 2.11 | | 3226.07 | |
| 亲戚朋友 | 男 | 2.01 | 0.289 | 2497.67 | 0.049 |
| | 女 | 2.26 | | 3409.36 | |

2. 贷款用途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调查研究中,我们将贷款用途分为“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商业、看病、上学、人情、交税费、还账、其他”10种,每位被调查者限选3项。经汇总统计排名前五位贷款用途如表4:

表4 贷款用途的性别比较

| 排名 | 男性 | | 女性 | |
|-----|-----|-------|-----|-------|
| | 用途 | 占比 | 用途 | 占比 |
| 第一位 | 养殖业 | 66.9% | 养殖业 | 70.2% |
| 第二位 | 种植业 | 58.5% | 种植业 | 60.7% |
| 第三位 | 商业 | 36.1% | 上学 | 24.9% |
| 第四位 | 其他 | 27.2% | 商业 | 23.1% |
| 第五位 | 上学 | 21.4% | 其他 | 21.3% |

男女农户的贷款都首先用于养殖业和种植业以满足生产需要,这一点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有66.9%的男性和70.2%的女性选择养殖业,并有60%左右的男性和女性选择了种植业。这种无差别,将女性和男性都放在了谋生计的平等位置上,排除那些挂名获得贷款、实际为男性使用贷款的女性,剩余的自主使用贷款于生产性活动的

女性,应该是女性自觉改变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自然安排。

性别在贷款用途上的差异表现在:女性第三位的选择是上学,占被调查女性农户的24.9%;男性农户的第三位选择是商业,占36.1%,而上学的用途排在第五位。男性多将借贷资金用于生产,而女性除了重视生产外,更多关注的是家庭成员,这种差别可能与男女两性的传统家庭角色有关。这是一个具有惯性的事实。

现有大多数的农村民间小额信贷设计中,原则上限定了贷款用于生产性增收项目,不主张将贷款用于孩子上学或者其他家用。可是当我们以性别变量来看贷款的用途,一些女性实际上改变了小额信贷组织的贷款管理原则,尽管这种改变可能带来还贷困难的风险,可是两相比较,女性选择牺牲自己(可能是贷款拖欠的信用风险,也可能是省吃俭用的健康损失)而满足孩子教育所需要的资金。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或许因为资源有限,无能力提供教育贷款,可是农村的其他金融组织是有这种能力的,为什么忽视妇女的这种金融需求呢?究其根本,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妇女也是金融社会中的组成部分。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里,女性是不被纳入视野的。这不是工作中的疏忽,或许纯属无意识地划定金融是男人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开发并且满足了女性的信贷需求,尽管有时是被动的。

3. 贷款使用效果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使用贷款的效果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呢?从调查分析的结果看,在获得过小额信贷的农户中,女性有96.9%的人认为小额信贷对自己的家庭有帮助,而男性中的这一比例为93%,差异的显著性 $p=0.006 (<0.05)$,即女性感受到小额信贷对家庭的帮助更大。将小额信贷对家庭的帮助量化,女性农户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贷款1000元平均能帮助家庭增收561.19元,比男性认为的增收平均值490.95元多出70元,虽然性别差异 $p=0.082 (>0.05)$ 在统计上不显著,但这种主观感受的性别差异有客观事实作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额信贷能给妇女带来更多帮助的事实。

再具体分析小额信贷所带来的其他方面影响。首先是对个体的影响。从表5的分析结果看,排名前两位的均是“收入增加、自我发展能力提高”。统计显示性别差异不显著。差异显著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指标上,一是“基本摆脱贫困”,二是家庭中的地位。男性中61.9%的人认为通过

小额信贷帮助家庭基本摆脱贫困，而女性中只有35.6%的人认同这个结论。关于这个问题上的性别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解释。^①同时，女性中有32.4%的人选择了“小额信贷使自己在家中地位提高”，是男性中该比例的两倍。这表明小额信贷对于农村家庭中男女权利的重新分配有作用。

表5 小额信贷对个体影响的性别比较

| 排名 | 男性 | | 女性 | |
|-----|----------|-------|----------|-------|
| | 影响方面 | 比例 | 影响方面 | 比例 |
| 第一位 | 收入增加 | 96.0% | 收入增加 | 91.8% |
| 第二位 | 自我发展能力提高 | 72.5% | 自我发展能力提高 | 61.4% |
| 第三位 | 基本摆脱贫困 | 61.9% | 基本摆脱贫困 | 35.6% |
| 第四位 | 认识更多的人 | 20.2% | 在家中地位提高 | 32.4% |
| 第五位 | 参与能力提高 | 16.2% | 认识更多的人 | 32.0% |

其次是小额信贷对家庭成员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影响。从表6的分析结果看，统计检验显示小额信贷对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中有45.8%的人认为获得小额信贷后，“一年四季都在忙，也不外出打工了”，而女性认为最大的变化在“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少了”，比例为33.2%。农村社会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自然性别分工，在新的历史时期表现为男人外出打工而妇女在家务农的社会性别分工。农村民间小额信贷以新的小资本注入的方式对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改变，使男性不再外出打工而回流农村从事生产性工作，同时也使女性更多地投入到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使农村建设有了新意：充足的资本与充足的劳动力结合。因此，尽管小额信贷的社会影响作用于男性和女性的方向不同、性别差异显著，但最终的效果却是性别回归与性别统一，达致女性和男性形成伙伴关系。无疑，这是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在社会性别上所产生的一个意外功能。

表6 小额信贷对家庭成员工作时间和地点影响的性别比较

| | 男性 | 女性 |
|-----------------|-------|-------|
| 一年四季都在忙，也不外出打工了 | 45.8% | 29.9% |
| 比过去忙一些，偶尔也外出打工 | 19.0% | 22.1% |
| 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少了 | 27.9% | 33.2% |
| 没有太大变化，和过去差不多 | 6.2% | 9.9% |
| 比以前清闲了 | 1.1% | 4.9% |
| 样本合计 | 369 | 485 |

第三是小额信贷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从表7的分析结果来看，男性和女性对小额信贷在乡村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的认知是一致的，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超过90%的人认为小额信贷改善了乡村经济状况，同时近2/3的人觉得小额信贷使农户之间更加团结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小额信贷使相互间更团结”的女性比男性高出近13个百分点，小额信贷在增加社会凝聚力方面的作用得到更多女性的认同。

表7 小额信贷对乡村社会经济影响的性别比较

| | 男性 | 女性 |
|--------------|-------|-------|
| 经济状况改善了 | 94.7% | 90.8% |
| 相互之间更团结了 | 65.5% | 78.1% |
| 相互之间信任增加了 | 62.0% | 64.3% |
| 村里集体经济办起来容易了 | 20.8% | 21.1% |
| 乡村干部比以前公开民主了 | 15.0% | 13.5% |
| 样本合计 | 413 | 512 |

4. 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特征认识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或项目）在当地农村几年到十几年的持续运作，对农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反之，农户也以切身体会、感受及行动对小额信贷发生反向的作用。

在小额信贷众多的特征项^②上，农户普遍感

① 的确，如果男性和女性对“基本摆脱贫困”有不同的理解，会影响到定量分析时的结果。这可能借助质性研究的方法才能确认事实是什么。有关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请见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有关小额信贷的特征，参见：（1）Muhammad Yunus, *Banker to the poor*, the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8. 中译本吴士宏译：《穷人的银行家》，三联书店，2006年，232页。关于格拉米银行的特征：为穷人所有，无抵押担保、法律文件、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98%为妇女等。（2）吴国宝：《中国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9页。关于小额信贷的特征有：以穷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实行小额短期贷款和分期还款制度，不需要担保，组织化，可持续性，公开透明，方便灵活，为穷人提供技术培训等。（3）张保民：《再次振兴小额信贷扶贫的政策建议》，见杜晓山：《中国小额信贷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8页。小额信贷的本质特征：小额短期、分期偿还、信用联保。（4）王卓：《小额信贷扶贫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21页。小额信贷的基本原理包括：向穷人提供小额度短期贷款、整贷零还、互助联保、连续贷款、妇女优先。

受到小额信贷“相互联保、整贷零还、无抵押”的显著特征。但是,具有明显差异的是对“妇女优先”的认识(参见表8)。有近70%的妇女认为“妇女优先”是小额信贷的首要特征,但男性中只有1/3的人认为“妇女优先”是小额信贷的特征且将之排在所有特征中的第四位。这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1)“妇女优先”作为特征(曾经)被放置在小额信贷组织(或者项目)里,并得到妇女的认同。(2)女性和男性对于“妇女优先”的认识是有显著差异的,在男性看来“妇女优先”仅先于“方便灵活”而被认识。(3)由于国内越来越多的小额信贷组织(或项目)受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放弃“妇女优先”的选择,男性(包括管理层和处在话语权中心的政策研究者)对小额信贷中的性别倾向变得不再敏感甚至出现盲视的现象。

表8 对小额信贷特征认识的性别比较

| 排名 | 男性 | | 女性 | |
|-----|------|-------|------|-------|
| | 特征 | 比例 | 特征 | 比例 |
| 第一位 | 相互联保 | 66.4% | 妇女优先 | 69.4% |
| 第二位 | 整贷零还 | 60.7% | 相互联保 | 62.9% |
| 第三位 | 无抵押 | 54.2% | 整贷零还 | 40.3% |
| 第四位 | 妇女优先 | 35.5% | 无抵押 | 32.0% |
| 第五位 | 方便灵活 | 21.1% | 穷人优先 | 26.7% |

5. 小额信贷作用于农户团结互助和信用评价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我国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在复制GB模式和探索中国特色小额信贷模式过程中,通过建立贷款农户小组和中心的方式来培育和强调农户的组织意识和相互之间的团结互助,同时也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形成的社会压力来降低无抵押担保贷款的还款风险,从而形成好的信用环境。本小节通过三个指标来评价性别在这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对“无抵押担保”的理解,二是“贷款拖欠的原因”的分析,三是对社区信用环境和自己人的信用评价。

关于无抵押担保的理解,64.6%的男性认为获得农村民间的小额信贷不需要抵押或担保,不同的是只有29.8%的女性认为获得小额信贷不需要抵押担保,两者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p = 0.000 (< 0.05)$,即对于同样的小额信贷模式,男性和女性对“无抵押担保”的看法却出现显著差异,较多的女性认为向小额信贷借款需要抵押或担保。

事实上,在所调查的西部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中提供的都是无抵押担保的贷款。进一步的深入访谈发现,男性对抵押担保的理解侧重物质和金钱方面,女性认为贷款小组农户之间的相互联保关

系就是另一种性质的抵押担保。在女性农户看来,联保农户之间的人情往来和社会关系也比较重要,彼此的信任是用金钱或物质换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可能倾向于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男性倾向于经济性。

调查中,我们根据前期研究和观察将农户贷款拖欠的原因分为多种,见表9。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贷款农户发生拖欠的原因评价上差异不大,基本是一致的。略有差异的只是排序上,女性将“家人病故、孩子上学等,欠下债务”作为产生贷款拖欠的第二个原因,而男性将此放在第三位,这与前面男女两性的家庭角色有关。此不赘述。

表9 农户拖欠贷款原因的性别比较

| 排名 | 男性 | | 女性 | |
|-----|-----------------|-------|-----------------|-------|
| | 拖欠原因 | 比例 | 拖欠原因 | 比例 |
| 第一位 | 一时周转困难 | 30.7% | 一时周转困难 | 31.6% |
| 第二位 | 经营失败,没有钱还 | 29.5% | 家人病故、孩子上学等,欠下债务 | 29.9% |
| 第三位 | 家人病故、孩子上学等,欠下债务 | 28.0% | 经营失败,没有钱还 | 29.0% |
| 第四位 | 不讲信用,有意赖账 | 4.9% | 不讲信用,有意赖账 | 4.5% |
| 第五位 | 不了解,以为是扶贫款,可以不还 | 2.8% | 不了解,以为是扶贫款,可以不还 | 2.2% |

关于小额信贷与农村信用环境关系上的性别差异,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对自己信用的评价,二是对自己人的信用评价,三是对社区信用的评价。

对自己的信用评价以“按时足额还款”为测量指标,绝大多数农户认为按时足额还款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99.3%的男性和99.6%的女性都表示大家都应该讲信用并及时还款,这对农村民间金融及小额信贷的发展是一个利好的信号。统计检验,在自己信用评价上性别差异不显著,男性和女性在“按时足额还款”的态度上一致,农户评价自己有较强的信用道德观念。

在自己人的信用评价上,我们选用了“当出现还款困难时,农户与有联保关系农户之间的互助”作为评价指标。调查发现,在出现还款困难的时候,大多数农户表示会帮助联保户。其中,男性表示会帮助的占61.1%,女性这一比例占65.8%,差异的显著性 $p = 0.139 (> 0.05)$,即性别差异不显著。在自己对联保农户的帮助上,男性和女性无差异。

调查同时发现,当出现还款困难时,大多数农户认为联保农户会帮助自己。其中,71.8%的男性认为联保农户会帮助自己,女性这一比例是

74.7%, 差异的显著性 $p = 0.321$ ($> P = 0.05$), 性别差异不显著。即, 在评价联保农户对自己的帮助上, 男性和女性不存在差异。

简言之, 在评价自己人的信用和相互团结上, 性别差异不显著。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农户对自己人的信用程度比对自己信用程度的评价降低了 30 个百分点。

在农户对社区信用的评价上, 调查发现, 男性和女性在此评价上的 T 检验的值 $P = 0.001$ (< 0.05), 表明性别差异显著。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 18.5% 的女性农户认为“周围的人是诚实可信的”, 比男性农户在这个问题上的评价高出 7 个百分点, 另外在“大多数人是诚实可信的”这一选项上, 两者比例接近(参见表 10)。即女性农户对社区信用的评价高于男性。换言之, 女性的信用环境可能比男性好, 同时也表明女性对社区的信任度高于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额信贷以妇女为重点贷款服务对象建立互助小组和中心不仅有社会心理基础, 还有利于强化妇女的团结及凝聚。

表 10 对社区诚信度评价的性别比较

| | 男性 (%) | 女性 (%) |
|------|--------|--------|
| 是 | 11.2% | 18.5% |
| 大多数是 | 56.0% | 56.7% |
| 基本上是 | 32.1% | 24.0% |
| 样本合计 | 430 | 524 |

6. 小额信贷扶贫功能认识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小额信贷自从被引入中国就与扶贫密切相关。尽管在实践过程中, 一些小额信贷组织, 尤其是政府主导下的小额信贷经营性公司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盈利性, 但在总体上, 目前中国农村民间的小额信贷组织仍属于福利型, 比较注重小额信贷对改善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作用, 它对贫困家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本小节, 我们继续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探讨小额信贷机构在扶贫上的功能体现。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小额信贷机构在微观意义上的扶贫, 二是农户对小额信贷机构盈利性质的理解, 三是特别条件下小额信贷组织的扶贫本质。

判断小额信贷组织是否扶贫, 在业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 贷款对象是否贫困户。众所周知, 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对于绝对贫困家庭, 各国基本上采取的扶贫措施就是救济, 当然孟加拉乡村银行给乞丐提供小额信贷是极其例外的挑战性

方式。国际上对于相对贫困的界定就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 50% 或 25% 以下的家庭或人口的状况。以相对贫困标准来分析本次调查对象的生活水平, 我们发现: 西部小额信贷贷款农户对家庭自我经济状况的评价居于中等偏下。^① 其中, 女性小额信贷户对其家庭状况的评价稍劣于男性, 通过显著性检验, T 检验的值 $P = 0.076$ (> 0.05), 性别差异不显著(参见表 11)。即当下中国西部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的贷款服务对象大多数以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为重点, 而且没有性别差异。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93.7% 的男性认为小额信贷对穷人有帮助, 96.0% 的女性认为小额信贷对穷人有帮助。统计检验, 差异的显著性 $p = 0.107$ (> 0.05), 性别差异不显著。即无论男性或者女性, 农户都体验到了小额信贷的扶贫作用, 大多数农户都认为小额信贷对穷人有帮助。小额信贷在微观意义上发挥了扶贫的功能, 而且没有性别差异。

小额信贷组织的盈利性要求在国际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得到极大的重视, 并成为评价小额信贷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小额信贷在这个背景下, 近年来也开始强调组织的经营管理并维持盈利能力。事实上, 这不应该只是小额信贷行业性或者组织单方面要求就能实现的, 它需要服务对象的理解和支持。在小额信贷组织是否应该赚钱的问题上(参见表 11), 显著性检验显示, 男性和女性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女性更倾向于小额信贷组织应该赚钱。更有意思的是, 在小额信贷服务机构的经营状况关心程度的比较上, 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女性关心机构经营程度赋值的均值小于男性, 显著性检验显示: 差异的显著性 $P = 0.002$ (< 0.05), 即女性比男性更关心小额信贷组织的经营管理状况。

小额信贷扶贫的第三层涵义是可持续的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制度。也就是说, 对于中国西部农村而言, 除了既有的扶贫政策, 对于广大的低收入农村家庭来讲, 最好的扶贫就是建立和完善可持续的制度, 其中, 可持续的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建立小额信贷扶贫的第三层涵义。调查发现, 在西部农村, 不论男性和女性都希望小额信贷组织可长期为村民提供金融服务(参见表 11), 差异的显著性 $P = 0.699$ (> 0.05), 性别差异不显著。可是, 对于农

① 由于缺乏可信的统计数据来说明小额信贷农户的收入状况, 本研究采用了农户家庭状况的自我综合评价量表体系。问题设置为“和周围其他人比较, 您认为您家各方面情况属于: (1) 上等 (2) 中上 (3) 中等 (4) 中下 (5) 下等”。

村金融服务与政府的关系上,男性和女性的态度相差比较大(见表11)。56.5%的女性认为政府应该在农村民间金融服务上多有作为,而男性中这一比例只有39.0%,差异的显著性 $p=0.000(<0.05)$,对于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制度性要求,性别差异明显。女性农户对此的要求更加强烈。这和西部农村女性所处社会经济地位难以改变有密切关系,贫困农妇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途径缺乏,使其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方面,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表11 评价小额信贷扶贫作用的性别比较

| | 男性 | 女性 | 显著性 |
|-------------------------|-------|-------|-------|
| 家庭状况程度 ^① | 3.39 | 3.27 | 0.076 |
| 对穷人有帮助 | 93.7% | 96.0% | 0.107 |
| 应该赚钱程度 ^② | 2.32 | 2.16 | 0.008 |
| 关心机构经营程度 ^③ | 3.02 | 2.97 | 0.002 |
| 希望长期提供服务程度 ^④ | 2.07 | 2.09 | 0.699 |
| 希望政府管理多一点 | 39.0% | 56.5% | 0.000 |

四、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及其影响,并借助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对分布在中国西部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的性别二元(女性小额信贷户和男性小额信贷户)进行了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多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分析和显著性检验等,主要研究结论和讨论如下:

1. 性别差异不显著的若干方面

(1) 在贷款获得的难易程度上性别差异不显著。由于农村民间小额信贷没有提供储蓄等其他金融服务,因此仅以贷款为例来看,我国西部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对农户没有顾及到,普遍感受到获得金融服务困难。

(2) 在小额信贷的贷款用途上,农村家庭的首位需要是生产性的,不论男性或是女性都优先将贷款用于养殖业和种植业。当“三农”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促进农民增加生产性收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环节。

(3) 小额信贷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评价,

性别不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农户普遍认为小额信贷对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挥了好的作用。

(4) 对小额信贷的特征(妇女优先除外)认识,性别差异不明显,农户都认为“相互联保、整贷零还、无抵押”是小额信贷的显著特征。小额信贷以反传统的金融方式在农村开展信贷服务,通过十余年的实践和金融认知教育,已经初步获得农村社会的认同。

(5) 在贷款拖欠原因的自我评价上,性别差异不显著。农户中恶意拖欠的人基本没有,出现还款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三个方面:短期周转困难;项目经营失败;家庭现金流突然发生变化,如孩子上学需要大笔开支、家庭成员生病开支增加等。在无恶意拖欠的情况下,目前国内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多从人性化管理出发,给予这些农户新的贷款,或者重新调整贷款的使用时间,以帮助农户缓解困境。

(6) 在小额信贷对农村信用环境的建设与促进方面,农户对自己的信用评价很高,接近100%,且性别差异不显著;在对自己人也就是具有联保关系的农户信用认知上,性别差异也不显著,但信用程度降低了30个百分点。如果按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⁷⁾来解释农村的信用环境,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以自己为中心的信用关系随着他人与自己关系的疏远而递减。性别上的无差异局限在具有亲密关系的圈子人内部。

(7) 农户普遍认为当下中国西部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以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为贷款服务对象,性别差异不显著。即农户体验到了小额信贷的扶贫作用。

(8) 在中国西部农村,不论男性和女性都希望小额信贷组织可长期为村民提供金融服务,性别差异不显著。这和前面的第一条相呼应,在政府正规的农村金融服务难以到达农村或者低收入群体的时候,农户更迫切地寄望于已经在现场的农村民间小额信贷能够长期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2. 性别差异显著的若干方面

- ① 家庭状况程度设为“上等”、“中上”、“中等”、“中下”、“下等”五级量表,分别赋值1-5分,进而计算均值和显著性P值。
- ② 应该赚钱程度设为“当然应该”、“应该”、“无所谓”、“不应该”、“决不应该”五级量表,分别赋值1-5分,进而计算均值和显著性P值。
- ③ 关心机构经营程度设为“很关心”、“比较关心”、“关心”、“没有留意”、“不关心”五级量表,分别赋值1-5分,进而计算均值和显著性P值。
- ④ 希望长期提供服务程度设为“很希望”、“比较希望”、“希望”、“无所谓”、“不希望”五级量表,分别赋值1-5分,进而计算均值和显著性P值。

(1) 就金融服务(即包括各种可获得的金融服务,如信用社、民间高利贷、亲朋好友借贷、小额信贷等)而言,在贷款需求和实际获得贷款量上,性别差异显著,男性农户不论是需求量还是实际获得的贷款量都远大于女性农户。单就小额信贷而言,也是男性农户获得的贷款数量多于女性农户。在农村正规金融环境对男女农户一致不利的情况下,男性所获得的金融服务比女性所获得金融服务要好一些,以扶贫为主要使命的小额信贷在了解性别差异显著的情况下,应该重点向农村妇女,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妇女提供倾斜性的金融服务。

(2) 贷款用途上有差异的是贷款使用的优先顺序,比较多的女性将贷款用于上学和家庭其他生活性用途。以社会性别视角来看民间小额信贷服务,需要多元化的产品设计满足男女农户的不同需要,如果一味强调生产性贷款或者增加收入的贷款,女性的贷款需要就很难获得满足。其实女性将贷款用于子女上学是一项更长期的人力资本投入;同时将贷款用于家庭生活,实质上也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因此,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应该“以人为本”,开发适合农村家庭生活需要的服务内容,避免异化为纯粹“以放贷为本”的商业性的金融组织。

(3) 在小额信贷贷款使用效果上,小额信贷对女性农户的帮助显著地大于对男性农户的帮助,女性农户每1000元贷款增收比男性农户多70元,这对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小额信贷对家庭成员劳动时间和劳动地点的影响,在男性和女性都表现为将向农业生产和农村集中的趋势。但是方向不同,男性更多的是由外出打工回流农业和农村,女性更多的是从家庭流向生产性劳动场所。

(4) 对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妇女优先”特征的认识上,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期望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坚持妇女优先,男性在这个方面无社会性别意识。

(5) 对于小额信贷组织贷款给农户是否需要

抵押或担保,性别差异显著,大多数男性认为不需要抵押或担保,而大多数女性认为需要抵押或担保。女性对抵押担保条件的理解更具社会学意义,也接近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原创者的设计理念。

(6) 对社区信用环境的评价,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更加积极地评价社区的信用环境,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信用水平要高一些。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应该正确地运用和强化妇女的信用意识,以利相互之间的团结和凝聚。

(7) 在小额信贷组织是否应该赚钱的问题上,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普遍认为小额信贷组织应该有盈利。在对小额信贷服务机构的经营状况关心程度的比较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妇女比男性更关心小额信贷组织的经营管理。因此,中国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要想可持续发展,应将服务对象重点集中在女性。这是中观层面上小额信贷扶贫功能的体现,也就是说小额信贷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小额信贷组织的可持续扶贫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缺一不可。

(8) 对于农村民间金融服务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对农村民间金融服务的制度性要求,性别差异明显。女性农户更加关注农村民间金融与政府的关系,希望农村民间金融服务在政府的管理下制度化和规范化。

目前,发端于农村民间的小额信贷试验以及农村金融落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现状,已经促使政府、金融及其监管机构出台多种类型和模式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的政策,如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这些组织的设计是否符合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给予关注,一是认真总结、吸收并借鉴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十余年的经验教训,切实改革传统农村金融的经营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全新的社区金融意识。二是在“以人为本”的社区金融理念指导下,树立金融服务的社会性别意识,使普惠金融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流。

[参考文献]

- [1] 吴小英.“他者”的经验和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02,(6):124.
- [2] [4] 张宛丽.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论探析[J].浙江学刊,2003,(1).
- [3] <http://www.grameen-info.org>.
- [5] 黄承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社会性别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学术论坛,2005,(7).
- [6] 王卓.小额信贷与缓解妇女贫困[A].经济开发论坛[C].1999,(1):22-26.
-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

(责任编辑:何频)